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研究

李子林¹,王玉珏²,许佳欣²

(1.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建构以官方档案来源为基础。档案机构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记录的收集和保管,将“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互联,有利于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社会记忆。通过文献研究和政策文本分析,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的内涵、理论依据进行阐释,肯定公众档案记忆还原历史与真相、维护社会记忆完整性、开展社会性纪念活动、增强社会人文关怀的价值。档案机构开展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建议包括:将社会公众记录纳入公共卫生事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收集,鼓励和指导私人建档和社区建档,构建公共卫生事件记忆工程,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公众档案;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G275;R1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0)03-0052-06

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有利于记录和反映公共卫生事件历史面貌,维护集体记忆内容的多样性与完整性,提升国家向心力与民族凝聚力。国外在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项目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展的非典新闻与预警档案库(SARS News and Alerts Archive)项目。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以“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并含“档案”“档案记忆”“记忆项目”进行主题检索,总结出国内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建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公共卫生事件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创伤记忆建构的价值。如,

宫敏等认为,公共卫生事件等灾难档案记录了人类在抗灾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意志以及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是子孙后代深入了解和学习的社会记忆素材^[1]。李胜文提出,档案馆对公共卫生事件等创伤事件档案展开收集、提供利用,有利于促进创伤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建构民族、地区创伤记忆方面影响深远^[2]。②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建构的方法与途径。如,龙珊珊等分析数字档案馆建设在数字记忆、档案记忆建构方面的优势^[3];聂勇浩等提出网络时代构建数字记忆、档案记忆的社会共建模式,主张参与主体的社会化与档案收集的多样化^[4];蔡盈芳倡导建立国家突发事件

收稿日期:2020-03-3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李子林(1995—),女,安徽亳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档案记忆研究。

档案专题数据库,强调档案的记忆属性,发挥档案资政参考价值^[5]。由此可见,学者对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建构的研究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以理论价值探讨和国外经验借鉴为主,缺少专门的国内档案记忆实践项目支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档案界公共卫生事件档案研究侧重“官方叙事”视角下档案收集、管理,档案部门重点对党政机关、公共卫生机构形成的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进行收集、管理以及档案记忆工程的探索。笔者强调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记录的收集和保管,推进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实现“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的互联,完成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社会记忆的总目标。

一、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内涵及意义

1.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内涵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是社会公众基于该类事件档案的收集、保存和利用、传播而形成的共同回忆、印记,也是一个国家、民族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可看作从社会公众视角出发将公共卫生事件“昔日重现”的过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是社会公众对该事件个人记忆的外化和延展。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病患、病患家属、医生、护士、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将该事件中的个人亲身经历、思考以各种方式记录下来,实现个人记忆的迁移和外化。作为个人记忆的延展物,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与官方档案相比,具有视角向“下”、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基于此建构的公众档案记忆,彰显着社会大背景下民众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心理感受与情感诉求。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的收集、整理、组织和利用是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过程。档案记忆观主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6],即档案机构对档案的收集、鉴定和销毁一定程度决定哪些记忆资源可能被留存;档案整理、组织和利用一定程度决定社会记忆建构的具体框架和路径。以公众档案作为记忆素材,从多维度运用多媒介或技术工具对其进行组织、加工和呈现,可以实现社会记忆的建构。2020年2月,中国网民在GitHub平台上发起“2019 新冠肺炎记忆”(2019nCovMemory)项目,广泛收录保存与该事件相关的媒体报道、非虚构作品和亲历者个人叙述的记录,运用网络存档留存当

代社会各界的疫情记忆^[7]。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是对官方叙事体系下档案记忆的补充。从档案内容看,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从档案形式看,包括当事人、旁观者等形成的文字、声像、口述材料。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除常规的“事件记录型档案”,即当事人、旁观者描述疫情事件的文字、声像、视频等真实记录,还包括“社会求助型档案”,即个人或组织发布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医疗求助信息。另外,“个人心路历程档案”,例如豆瓣话题“封城日记”下武汉民众的心情日志也是一类重要的档案。相较于官方机构形成的档案,公众档案内容广泛、主题多样、表达方式贴近民众,可以极大增强档案记忆的大众叙事属性,以公众或喜或忧、或从容或恐慌的真实故事还原过往记忆的瞬间。

2.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意义

有利于还原历史事实与真相。档案的凭证性是区别于图书、资料等其他类文献信息的本质属性,这为运用档案还原公共卫生事件原貌,厘清事件过程、细节提供依据。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以广大群众的档案为根基,弥补官方叙事的内容空缺和细节忽略。武汉民众在自媒体平台发布的关于疫区医疗情况、社会治安、物资分配、社区生活的各类记录,反映了社会大众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真实声音与诉求。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各界在事件结束后总结经验、查明疏漏、反思决策。对公众档案记忆进行客观、理性分析,有助于引导和校正不当的社会观念和公众言论,为类似事件的有效响应、舆论管控提供参考资料。

有利于维护社会记忆的完整。无论是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还是社会群体对历史事件的追忆,都不可能是充分完整的,不可避免伴随着遗漏、偏差和忘却。官方叙事体系下,档案参与社会记忆建构具有一定单一性、片面性、刻板化的色彩。在“官方记忆场”下,档案资源体系聚焦于宏观层面的事件发展过程、官方机构的应对举措,而对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微观情感和真实心声关注不多。建构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可推动民间叙事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促进“民间记忆场”和“官方记忆场”的协同共建,以达到维护社会记忆完整性的终极目标。

有利于开展社会性纪念活动。法国史学家

Nora 提出:档案具有纪念价值,即档案对不可见事物的解释价值;现代记忆最重要的是档案,档案馆是建构历史记忆或现代记忆的场所^[8]。公共卫生事件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档案机构以存档的方式对其进行保存和诠释,实质上在发挥档案对社会事件的纪念功能。当社会公众在疫情结束后走进档案馆翻开档案卷宗的那一刻,关于往事的记忆将被触发,在与档案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对该事件的纪念。2020年2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面向全社会征集江苏支援疫区的各类档案资料,以建构公众档案记忆的方式帮助全社会实现对抗疫珍贵瞬间的铭刻和纪念。

有利于增强社会的人文关怀。记忆是有温度的,档案也同样是有温情的。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的,记录着其亲历或观察该事件产生的真实感受,基于此建构的社会记忆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感和关怀。社会公众借助叙事和记录抒发个人见解,宣泄内心情绪,与他人、社会建立情感共鸣,以抚慰心灵的创伤。档案机构通过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记录进行收集、存档,实现对散落在社会空间内记忆碎片的采集和整合,建构属于公众的档案记忆。档案工作者以积极的倾听者和中介者的身份,帮助公众将属于自己的故事妥善存放,借助公众档案记忆增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

二、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构建的理论基础

1. 档案记忆观

对档案与记忆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Taylor于1982年提出档案是一种定格于时空的集体记忆^[9]。档案界对档案的记忆功能及其与社会记忆关系的探讨为我国档案记忆观的形成奠定基础。2009年,丁华东提出“档案记忆观”一词^[10];冯惠玲于2012年将档案记忆观的基本内容归纳为:“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11]。在此基础上,徐拥军对档案记忆观作系统论述,“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6]。

档案记忆观认为社会记忆是由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组成、交织和汇集而形成的,社会记忆的建构应以广泛的社会公众档案为核心要素,这对档案馆以

官方叙事为主体的档案收集策略提出挑战。在档案记忆观指导下,公共卫生事件档案记忆的建构不仅涉及官方机构的档案,社会公众的档案也应作为重要资源纳入其中。档案工作者应从业务导向、服务于官方机构的记录管理者角色中脱离,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档案机构应从社会公众视角出发,探索档案资源的收集、管理和利用机制与方式,以传承全面的社会记忆为目的开展档案工作,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作为人类记忆库的社会职能。

2. 媒介记忆理论

“媒介记忆”最早由美国学者 Kitch 提出,该概念试图探讨在运作中,媒介如何扮演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12]。Dijk 将媒介记忆定义为:“人们通过媒介技术制造并利用某些活动和对象,用于创建或再创建与人类有关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13]。媒介,尤其是新媒介、数字媒介的应用对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影响成为媒介记忆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Garde 对英国2007年洪水灾害事件进行分析,探讨个人和社群如何借助媒介记忆实践活动实现社会记忆建构和遗忘^[14]。Farinosi 等对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地震事件的记忆网站进行遍历,分析网站用户对该事件的叙述和活动,总结出在灾难事件后,网页媒介存储、处理和分享社会记忆的方式^[15]。

媒介记忆理论将媒介与社会记忆进行关联,强调媒介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媒介记忆理论认为,数字媒介能够帮助人们记录,也可以作为人们存储和传播记忆的手段,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也可以作为用户自我展演与记忆传布的行动性工具^[16]。鉴于此,社会公众在媒介环境下产生的记录是公众个人记忆的外化,也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关键要素。当前,社会公众围绕公共卫生事件叙事的能力日益增强,从口头叙事、文本叙事发展到借助数字媒介的音视频叙事、超链接叙事、交互性叙事。大众叙事记录数量的增多和内容的多元化也为社会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全面的原始素材。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社会记忆建构的新特点为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开辟实施路径。档案机构应敏锐捕捉到媒介环境对公民记录生成、存档、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产生的一系列影响,重点关注各类媒介平台上公共卫生事件公众记录的采集、存档和提供利用,以减少媒介记忆的消失,留存完整的公共卫生

事件公众记忆。

3. 总体档案观

总体档案观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威尔弗雷德·史密斯提出的加拿大档案哲学三大原则:第一,档案馆强调收集和保存政府的公共记录和对国家知识、文化史做出贡献公民的私人记录的双重责任,档案工作者应记录所有加拿大社会的历史,而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历史;第二,档案馆收集各种媒介类型的档案,为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提供对加拿大国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第三,档案馆支持文件生命周期概念,实现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一体化^[17]。在此基础上,1980年“总体档案观”概念被正式提出。总体档案观作为加拿大的档案战略,强调档案收集的公共和私人双重属性,将公众档案纳入收集归档的范围,同时,其重视对多种介质形式档案的收集,包括建筑设计图纸、制图材料、视听记录、缩微胶卷等^[18]。

总体档案观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的收集和保管提供战略指导。首先,总体档案观为公众档案的收集、保管提供国家层面的理论可行性。一个国家是由多元文化和族群组成的,而反映这一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应该是多元和丰富多彩的^[19]。总体档案观主张将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同时纳入国家管理的档案范畴。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作为区别于政府公共记录的私人记录,其来源主体是具备多元民族、文化和职业背景的社会公众,作为社会公众经历、参与该类事件过程中形成的原始私人记录,公众档案同样具备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与官方档案共同组成完整的社会档案集合。其次,总体档案观为档案馆参与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工作提供参考范本。我国档案部门在建构公众档案记忆的过程中应重视对新媒介环境下社会公众产生的各类记录进行收集与保管。

4. 档案多元论

档案多元论最早由Gilliland为首的档案学者提出并定义:相对主义者或非主流的社区和国际化视野下的一种档案范式,反映多元视角下档案存在及其建构意图的多元特征,揭示出学术机构、官方机构和个人在档案证据性文本和记忆留存意图方面的多样性^[20]。档案多元论以存在于多样性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中的复杂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主张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为档案及档案工作提供新的方

法论指导和实施路径参考^[21],同时,也为跨机构、跨文化、跨社群的全球视角认知档案权力、档案话语、档案实践模式及社会影响提供融合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混合方法论^[22]。

档案多元论主张尊重档案来源(形成)主体的多元化,以包容、开放、全面的眼光将多元档案来源主体纳入档案业务工作范畴^[23],该观点强化了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收集的合理性,将普通民众纳入档案来源主体的范畴。此外,档案多元论承认档案本质属性的多元化,主张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解读档案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重新思考档案及档案工作,这启示我们应将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的社会性、文化性、情感性等特征融入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过程。与此同时,档案多元论强调档案价值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主张打破档案作为官方特权发声的工具,使档案重归社会公众的“怀抱”,鼓励社会群体借助档案记录社群变迁历史,构建集体记忆,这将推动档案机构重新审视档案工作参与社会记忆的传统模式,将档案工作范围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下,从民间叙事视角考虑社会记忆的建构。

三、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24]。缺乏公众档案印证的历史必然是片面的,缺少公众声音反映的记忆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将公众档案纳入公共卫生事件的归档范围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历史要求。档案工作者作为“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应努力发挥作用,做好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工作,为传承国家、民族和世界记忆作出贡献。

1. 将社会公众记录纳入公共卫生事件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湖北省档案馆于2020年2月13日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档案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疫情防控档案收集归档范围主要包括:上级和本级部门的相关部署、规定、通知等;交通、医疗、部队、学校等事业单位在疫情防治中形成的有关资料等21个方面。随后,江西省、深圳市、山东省、上海市档案馆也纷纷出台为援鄂医护人员建档及疫

情防控档案收集的制度。尽管部分省市档案部门也在收集范围中提及对公众档案的收集,但其收集范围仍主要侧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抗疫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抗疫工作需要“团结奋战”“同舟共济”,人民群众是战“疫”取胜至关重要的因素。公众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与参与者,从不同的视角留下的真实记录应得到充分重视。档案机构应将社会公众记录纳入文件材料归档范围,成为社会认同与集体记忆的重要依托,实现社会记忆的多元叙事表达。

2.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收集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社会公众作为记录主体,对记录中蕴含的价值、意义和情感更为了解,能够帮助档案工作者更加全面、客观、合理地开展档案收集和鉴定工作。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卫生事件档案收集,有利于维护我国公众档案权利。社会公众从档案机构手中接过档案择选的“权力之钥”,也是对传统官本位档案收集策略的一种突破。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档案馆已开始面向社会公众征集公共卫生事件档案。2020年2月14日,江苏省档案馆发布《关于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呼吁社会公众精心保存好手中的与此次疫情防控相关的珍贵档案资料,鼓励社会各界、各团体及有关个人与档案馆联系,以自愿捐赠的方式向档案馆移交档案。随后,上海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也纷纷发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战疫”档案资料的公告》,重点强调并鼓励社会公众向档案馆捐赠在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战疫”主题的文字、组图、网页、音视频等档案资料。在数字媒体时代,人民群众借助图片、视频、直播等媒介,以不同形式对这一事件进行记录与传播,对建构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档案记忆具有重要价值。

3. 鼓励和指导私人建档和社区建档

社会公众对于档案的痴迷源于对过去消失的恐惧以及对未来期待的执着,数字媒介时代为公众这种档案心理的满足提供了有利条件。无论是近年来风靡国外的“9·11 Digital Archive”数字档案馆项目^[25],还是中国网民自发启动的2019nCovMemory网络存档项目^[7],都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私人存档意识与存档能力的不断提升。档案机构不再是唯一的建档主体,社会公众利用档案维护个人权益、发出集

体声音、留存社会记忆的意愿和诉求正在逐渐增强。在此背景下,档案机构应在做好本职业务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私人建档、社区建档价值理念、实践方法的宣传和指导。以“档案进社区”“档案进家门”“家庭档案保管小课堂”等方式提升社区居民个人档案、家庭档案管理意识和能力,帮助社会公众实现记录经历和分享故事的愿望,为公众档案记忆的建构留存丰富、多样的素材。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档案特藏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旧金山社区内艾滋病患者的个人日记、手稿、信件以及医护记录进行收集、存档,同时,档案工作者为患者及家属提供家庭档案保存指导与咨询服务。这些公众档案资料为美国公共卫生历史研究和社区公共卫生治理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社区后代民众了解和回顾社区艾滋病抗争史,积极参与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做出贡献。公共卫生事件下私人建档、社区建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推动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社会化转向,档案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保存记录、留存档案的责任和义务。

4. 构建公共卫生事件记忆工程

档案是国家、社会、个人一切活动的真实记录,是党和人民从过去汲取经验更好地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华民族记忆存续的重要载体和媒介。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国档案领域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从档案工作服务国家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国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角度,提出搭建“突发事件专题档案数据库”^[26]“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档案数据库”^[5]等构想,十分值得肯定。然而,从社会微观视角出发,立足公众的记录和记忆需求开展档案资源建设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冯惠玲早在2012年就建议档案机构考虑构建“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从“官方记录”为主型向多元丰富的社会资源体系发展,以真实丰富的数字资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提供文献支撑,促进档案事业社会影响力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11],这为档案机构构建公共卫生事件记忆工程提供参考思路。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运营的数字档案馆项目“1918—1919 流感疫情:数字百科全书”,收录并保存美国流感疫情暴发时期的各类历史记录,其中各地社区居民的抗疫记录被重点收集和整理,以社区居民视角还原该事件的历史记忆,讲述民众自己的故事。档案机构在开展公共卫生事件记忆工程时,应注

重对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档案资源体系的平衡,以丰富、多元的档案素材记录我国公共卫生发展史、社会公众生活史,留存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

5. 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

丁华东等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一说中提及“对记忆事项所包含历史信息的加工和重组,是历史叙事的过程,也是记忆加工的基本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记忆事项功能和象征意义进行阐释,以实现意义层面的再生产,从而完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过程”^[27]。档案机构对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进行收集、整理、保存仅仅是完成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的初级目标。公众档案记忆能否在整个社会系统下实现再生产,发挥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关键还在于社会公众本身。档案机构在公众档案记忆再生产实现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扮演“助推器”的角色,结合业务专长、利用各方优势和资源,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资源的开放与传播,为社会公众提供挖掘公众档案资源内容、开发公众档案记忆价值的机会,真正做到“为民存档,为民服务”。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历史事件,社会公众可向档案机构查询并获取有关该事件的公众档案,并结合自身的人生经历、学识背景、认知观念对这些档案进行读解分析和价值诠释。社会公众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不断对档案建构的社会记忆进行复活、重现和扩散,从而促进档案记忆的再生产,为全人类记忆的常新与长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官敏,夏禹波,李晓鸥. 灾难档案的正能量开发[J]. 档案时空,2015(6):39-41.

[2] 李胜文. 档案馆社会创伤记忆建构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9.

[3] 龙珊珊,蔡娜.“9·11”数字档案馆对我国重大突发事件数字记忆构建的启示[J]. 北京档案,2017(1):43-45.

[4] 聂勇浩,郑俭,吴小娴. 数字记忆的社会共建模式:以国外特大灾难档案网站为例[J]. 档案与建设,2019(10):34-38.

[5] 蔡盈芳. 关于建立国家突发事件档案专题数据库的设想[N]. 中国档案报,2020-02-20(003).

[6] 徐拥军. 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7] 2020 新冠肺炎记忆:报道、非虚构与个人叙述[EB/OL]. [2020-02-15]. <https://github.com/2019ncov-memory/nCovMemory>.

[8]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J]. Representations, 1989,26(26):17-34.

[9] TAYLOR H A. The collective memory: archives and libraries as heritage[J]. Archivaria,1982(1):15.

[10] 丁华东. 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 档案管理,2009(1):16-20.

[11] 冯惠玲. 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 档案学通讯,2012(3):4-8.

[12] KITCH C. Pages of the past: 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5.

[13] DIJCK J V.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 GARDE H J. Media and memor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1.

[15] FARINOSI M, MICALIZZI A. Memory in a mediated world[M]. United Kingdom: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6] 刘于思. 从“记忆的技术”到“技术的记忆”:技术怀旧的文化实践、情感方式与关系进路[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5):121-127.

[17] SMITH W I, Archives: mirror of Canada Past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18] Consultative Group on Canadian Archives. Canadian Archives Report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R]. Canada, Ottawa: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1980.

[19] 威尔弗雷德·艾·史密斯.“总体档案”:加拿大的经验[J]. 档案学通讯,2001(4):71-75.

[20] GILLILAND A, MCKEMMISH S. Pluralising the archives in the multiverse: a report on work in progress [J]. Atlanti: Review of Modern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21):177-185.

[21] 李子林. 国外档案多元论的发展及其启示[J]. 档案学研究,2018(6):138-144.

[22] 安小米,郝春红. 国外档案多元论研究及其启示[J]. 北京档案,2014(11):16-20.

[23] 徐拥军,李子林,李孟秋. 后现代档案学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J]. 档案学通讯,2020(1):31-40.

[24]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EB/OL]. [2020-03-05].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3/content_2764226.htm.

[25] The September 11 Digital Archive [EB/OL]. [2020-03-05]. <https://911digitalarchive.org/>.

[26] 张斌,杨文.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管理[N]. 中国档案报,2020-02-10(003).

[27] 丁华东,张燕.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的学术价值与问题思考[J]. 档案学研究,2019(3):37-43.

(责任编辑:高虹)